

中国心理学

王 甦 林仲贤 荆其诚 主编

吉林教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2 号

中国心理科学

王 甦 林仲贤 荆其诚 主编

责任编辑：郑长利

封面设计：王劲涛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70.25 印张	4 插页	1 779 000 字
发行：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定价：125.00 元
印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ISBN 7-5383-3267-7/B·30				

前言

《中国心理科学》是一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的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专著。

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远景。旧中国基础薄弱的心理学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都获得可观的成就。但是,我国心理学在这40年来的发展却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道路是不平坦的,最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在我国的实施而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其中有不少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同时,从学术上总结我国心理学这40年的研究成果,肯定成绩,发现不足,可以使我们明确我国心理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促进我国心理学迅速发展。

为此,中国心理学会依靠集体力量编纂了这部《中国心理科学》。本书从我国心理学的实际情况出发,按一些心理学分支学科设置专题来撰写文章。所涉及的心理学科有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生物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工作心理学和体育运动心理学等。每个分支学科包含若干篇文章,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陆的心理科学各有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心理学研究状况暂缺。本书共收34篇文章,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我国心理学发展的面貌。

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我国心理学的发展,本书尽可能具体地阐述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并配以必要的图表,文后还列出较完整的参考文献,便于读者查阅,因而本书兼具某种手册的性质。

为推进本书的编纂工作,中国心理学会成立了《中国心理科学》编辑委员会,并按前述心理学分支下设了若干学科组。各学科组组长为彭聃龄(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车文博、燕国材(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匡培梓(生物心理学)、朱曼殊、许政援(发展心理学)、章志光(教育心理学)、沈德灿(社会心理学)、李心天(医学心理学)、徐联仓(工作心理学)和马启伟(体育运动心理学)。各篇文章的撰稿人均系各有关领域专家,由编辑委员会延聘。本书各文的编写大纲经各学科组分别讨论通过。文章初稿经学科组讨论后由撰稿人修改,最后由编辑委员会定稿。

《中国心理科学》的编纂是我国心理学界的一件大事。全国心理学界都给予了关心和支持。各位学科组长和撰稿人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负责精神,使本书的质量得到保证。其中,车文博教授在联系出版、协助终审方面还作了不少工作。这里,我们向各位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出版得到吉林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责任编辑、综合编辑室主任郑长利同志细心审阅书稿，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为提高本书质量作了大量工作。我们深表感谢。

限于我们的水平，本书肯定还有许多疏漏和不足，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王 甦 林仲贤 荆其诚

1995年1月28日

总 目 录

前 言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年来的心理学发展	王 甦 (1)

普通心理学 实验心理学

感觉和知觉的研究	林仲贤 (19)
颜色视觉研究	焦书兰 荆其诚 (72)
记忆过程研究	朱 滢 (96)
汉字的信息加工	彭聃龄 (128)
思维和语言理解	陈永明 朱新明 (176)
个性研究	高玉祥 (206)

理论心理学 心理学史

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车文博 (223)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	赵莉如 许其端 (278)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	燕国材 (305)
西方心理学史研究	孙名之 (360)

生物心理学

生理心理学研究	匡培梓 管林初 (409)
比较心理学研究	邵 郊 (440)

发展心理学

心理发展理论问题	胡士襄 卢 濬 (452)
儿童心理过程的发展	林崇德 (477)
儿童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沈家鲜 (542)

儿童语言的发展	朱曼殊 缪小春 (589)
儿童社会性发展	许政援 (624)
儿童发展的跨文化研究	方富熹 (653)
超常儿童心理研究	查子秀 (672)

教育心理学

中小学数学教学心理	赖昌贵 (704)
中小学语文教学心理	万云英 张必隐 (757)
品德心理研究	章志光 (787)
特殊儿童心理与教育	张宁生 茅于燕 (809)

社会心理学

个体与群体的社会心理研究	沈德灿 孙昌龄 (851)
法制心理学研究	罗大华 (870)

医学心理学

病理心理研究	龚耀先 唐秋萍 (895)
心理治疗与咨询	陈仲庚 钱铭怡 (932)
应激与心理因素在心身障碍中的作用	汤慈美 (966)
临床神经心理学研究	李心天 胡超群 (991)

工作心理学

劳动心理学与工程心理学研究	朱祖祥 (1020)
管理心理学研究	徐联仓 王重鸣 (1055)

体育运动心理学

运动训练与竞技心理的研究	丁雪琴 马启伟 (1068)
优秀运动员的心理特征与心理选材研究	邱宜均 (1089)
附: 英文目录	(11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年来的心理学发展

王 甦
(北京大学)

目 录

引言 (1)	
一、现代中国心理学的历史回顾 (2)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1949—1966) (4)	
(一) 调整 and 规划阶段 (1949—1956) (4)	
(二) 整风和批判阶段 (1957—1958) (6)	
(三) 初步发展阶段 (1959—1966) (7)	
三、文化革命时期 (1966—1976) (9)	
四、改革开放时期 (1977—) (10)	
(一) 恢复阶段 (1977—1980) (10)	
(二) 顺利发展阶段 (1981—) (11)	
五、总结和展望 (17)	

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 40 多年了。这 40 多年在中国 5000 年的悠久历史中是社会和经济
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各门科学随着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而蓬勃发展。旧中国基础薄弱的心理学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得到长足的进步。
但是，这 40 年来我国心理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发展的道路是不平坦的，遭受过

• 本文引述的文献均见本书各有关文章。

许多挫折,最终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而走上了顺利发展的道路。

40 年对一门科学来讲是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但我国心理学在此期间走过的道路却包含着许多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可以使我国更加自觉地面对未来,促进我国心理学更加迅速发展。

本文概括地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年来的心理学发展的一般情况。我们将这 40 年来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分成三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66)、文化革命时期(1966—1976)和改革开放时期(1977 年至今)。在这里我们首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现代心理学的历史作一简要的回顾。

一、现代中国心理学的历史回顾

在我国古代的浩繁文献中存在着大量关于心理学问题的论述,有很多闪耀着智慧之光的心理学思想。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制度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束缚,这些丰富的心理学思想未能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心理学。在我国,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清朝末年,即 19 世纪末,在西方心理学传入我国后才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我国早期的留学生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早期留美学生颜永京(1838—1898)于 1878 年在上海建成圣约翰书院并亲授心理学。1889 年他将美国 Haven 著《心灵哲学》(Mental Philosophy) 翻译出版(上),书名定为《心灵学》。他所说的《心灵学》也即心理学。据称这是第一部国人翻译的外国心理学著作(赵莉如,1983)。“心理学”这个汉语名词,可能是在 19 世纪末由日本传入的。

西方心理学在清末我国的传播得益于清政府推行的“废科举,兴学校”的新教育制度。清政府于 1903 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在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和大学堂章程中均规定开设心理学课程。其时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早有日籍教师讲授心理学。著名学者王国维(1877—1927)于 1903—1904 年曾在南通师范和苏州师范教授心理学,于 1907 年翻译出版了丹麦 Höffding 所著《心理学概论》(Outlines of Psychology),曾再版多次。1905 年我国留日学生陈槐参考日本心理学著作并结合中国实例编写出版了《心理易解》。这是国人自编的第一本心理学书,它反映了 20 世纪初我国接受西方心理学的水平(赵莉如,1992)。同年,南通师范和湖北师范还翻译或编译日本心理学书或讲义。在其他一些师范学校,心理学课程也陆续开设起来。

辛亥革命(1911)以后,心理学在我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对我国现代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蔡元培于 1907—1911 年留学德国,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三年,其时 Wundt 正在该校任教,蔡元培曾亲聆 Wundt 讲授心理学。蔡元培回国后任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1917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8 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都曾大力提倡和扶植心理学。就在 1917 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负责人是曾留学日本的陈大齐(1886—1983)。他曾进行过汉文的直读和横读的比较实验并对迷信问题写过一本小册子。这是中国学者在自己国内进行近代意义的心理学研究的开端(潘菽,1958)。陈大齐还于 1918 年出版了《心理学大纲》,这是国人自编的第一部大学心理学教科书。

五四运动(1919)前后是我国心理学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时一批留美专攻心理学的学者如陈鹤琴、廖世承、张耀翔、陆志韦、唐钺等相继回国。他们分别在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和北京高等师范等校开设心理学课程并进行学术研究和著译。心理学的影响迅速地展开

来。在五四运动的背景下,连续发生了几起对我国心理学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1920 年南京高等师范(后改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育科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心理系。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和北京高等师范均建立了心理实验室。1921 年成立了我国最早的心理学会——中华心理学会,张耀翔(1893—1964)任会长。次年出版了中华心理学会会刊《心理》,这是我国第一种专业心理学杂志。这些重大事件标志着我国现代心理学经历了自清末以来的几十年的时间而初步建立起来。此后又有一些大学先后建立了心理系或教育心理系,如复旦大学(1922)、大夏大学(1924)、北京大学(1926)、清华大学(1926)、燕京大学(1927)、辅仁大学(1929)。1929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了心理研究所,唐钺(1891—1986)任所长。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的心理学研究机构。至此,我国心理学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学术机构,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心理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本世纪 30 年代,我国心理学家更多地开展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与此相应,心理学刊物也增多了。1927 年《心理》杂志停刊后,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出版了《丛刊》和《专刊》(1934—1936);中央大学出版了《心理半年刊》、《心理附刊》(1934—1937)和《心理教育实验专篇》(1934—1939);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出版了《中国心理学报》(1936—1937);大夏大学出版了《心理季刊》(1936—1937)。在学会组织方面,中华心理学会于 1927 年随《心理》停刊而中止活动。1932 年成立了中国测验学会,出版了会刊《测验》(1932—1937)。1937 年重新成立了中国心理学会,将《中国心理学报》作为学会会刊。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于 1936 年也宣告成立。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内迁,一些心理系停办或与其他系合并,只保留了少数心理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国心理学家仍坚持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单位复员,一些大学恢复了心理系,直至 1949 年全国解放。

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30 年间,我国心理学走过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在旧中国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我国心理学家奋斗不息,初步建立起我国现代心理学,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包括儿童心理(陈鹤琴,1925;孙国华,1930;黄翼,1941)、心理过程(陆志韦,1922;程迺颐,1926)、汉字心理(周先庚,1929;艾伟,1949)、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潘菽,1931;张耀翔,1941)、心理测验(廖世承等,1925;陆志韦,1929)、工业心理(陈立,1935)、比较心理(郭任远,1934)和生理心理(汪敬熙,1944)等。我国老一辈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解放前我国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首先,心理学应有正确的思想指导。由于我国现代心理学是在西方心理学传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各种西方心理学流派在我国流传较广,影响也较大。针对这种状况,早在本世纪 30 年代,我国少数心理学家(潘菽,1931;郭一岑,1935;曹日昌,1938)就企图以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心理学,这种努力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第二,心理学要紧密结合我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早在 1922 年,我国第一种心理学杂志《心理》在创刊号上谈办刊宗旨时,要求我国心理学家根据国内外的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验,并且“内容则尽量求适合国情,形式尽量求中国化”。这种要求无疑是正确的。第三,重视心理学人才培养。解放前我国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心理学教育事业为依托的。由于我国一些大学心理系培养出一批人才,使早期主要由留学生组成的心理学家队伍,得到新的人才补充,推动我国心理学发展。以上所谈的几点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1949—196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科学技术有了广阔的发展前途,心理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66),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1956年的调整和规划阶段,1957—1958年的整风和批判阶段以及1959—1966年的初步发展阶段。

(一) 调整和规划阶段 (1949—1956)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短时间内,我国一些大学的心理系基本上维持不变。但也有些大学停开了心理学课程。1951年中国科学院设立了心理研究室。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两校心理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了当时国内唯一的一个心理专业。南京大学(前中央大学)心理系保留。其他大学心理系分别并入一些高等师范院校,成立了心理学教研组。

为了适应新社会的要求,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积极投入了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着重学习了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哲学笔记》与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逐步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同时结合心理学的现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批判了心理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随后,在我国心理学界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巴甫洛夫学说的基础上改造心理学的方针,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苏联心理学和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则成为当时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的主要活动。自1952年开始,教育部先后聘请4位苏联心理学家来华讲学。我国各地一些心理学工作者参加听讲。1953年夏卫生部举办了“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我国一些心理学工作者与生理学和医学工作者一道参加了学习会。随后,上海、天津、西安、昆明等城市心理学工作者也投入各地举办的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高潮。在此基础上,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先后建立了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实验室,开展了一些主要属于验证性质的实验研究。同时,在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巴甫洛夫著作和苏联心理学著作,在心理学教学中则采用苏联心理学教本。

在学习苏联心理学和巴甫洛夫学说的基础上,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开展了关于心理学的对象、任务、方法和学科性质的讨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心理活动与高级神经活动、心理学与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将心理活动与高级神经活动等同起来,认为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可以取代心理学。另一种观点则将心理活动与高级神经活动绝对对立起来,否认心理活动受高级神经活动规律的制约,认为心理活动和高级神经活动是大脑活动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多数人在讨论中不同意将心理活动等同于高级神经活动,也不同意将心理活动与高级神经活动绝对对立起来。我国多数心理学工作者采取了第三种观点,认为心理活动与高级神经活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反对取消心理学,同时又承认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对心理学有重要意义(朱智贤,1956;臧玉海,1956;潘菽,1956)。与此同时,还对一些西方心理学流派和观点开展了批判(陈立,1955;唐钺,1956;朱智贤,1956;阮镜清,1956;荆其诚、叶绚,1956),这种批

判后来仍继续进行（朱希亮，1958；荆其诚，1958 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 8 月即开始筹备恢复中国心理学会。1953 年成立了中国心理学会筹备委员会，办理会员重新登记，出版《心理学通讯》以联系全国各地工作。1955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正式重新成立中国心理学会。潘菽（1897—1988）任理事长，曹日昌（1911—1969）任副理事长，此时全国登记会员为 585 人。1956 年中国心理学会出版了学术刊物《心理学报》，曹日昌任主编；另外还出版了《心理学译报》，吴江霖任主编，主要刊载苏联心理学文献的译文。

1956 年，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心理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也制订了 12 年（1956—1967）的发展规划。按照这个规划，我国心理学应在下列几个方面开展研究：1. 心理的发生和发展的研究；2. 基本心理过程的研究，以视觉、听觉、记忆、语言、思维为重点；3. 个性心理的研究；4. 心理学基本理论和心理学史的研究，以中国心理学史为重点；5. 专业心理学，以教育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和医学心理学为重点（转引自潘菽，1958）。遵照规划，同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扩建为心理研究所。南京大学心理系随之并入该研究所。教育部也着手筹建教育科学研究所，在该所内包括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部分。心理学 12 年发展规划后来发生很大的变化，但规划的制订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心理学工作者。

总的来看，在这个时期，我国心理学工作者是遵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巴甫洛夫学说基础上改造心理学”的方针进行活动的。这个方针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是否要在巴甫洛夫学说基础上改造心理学，无论在当时或后来都存在着不同意见。一种看法认为，巴甫洛夫学说因袭着旧神经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因此心理学研究不应以巴甫洛夫学说为基础（刘泽如，1958）。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个方针片面夸大巴甫洛夫学说对于心理学的重要性，把它抬举到与马克思主义同等地位，成为新中国心理学发展初期曾经出现的生物学化偏向的根源之一（王极盛，1980）。与此不同，持肯定态度的看法则认为，巴甫洛夫学说是神经生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它为正确地理解人的心理的生理机制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依据，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可能是最主要的依据。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当时提出“以巴甫洛夫学说为基础改造心理学”的业务方针，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但是我国心理学界确实出现过滥用巴甫洛夫学说解释一切的现象（车文博等，1979）。

我们觉得，“在巴甫洛夫学说的基础上改造心理学”的方针是在建国初期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起来的，带有那个历史时期的特点。照我们看来，应当区分这个方针的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从政治方面来说，由于解放前一些西方心理学流派在我国有较大影响，而心理学又与哲学等社会科学有密切关系，在建国初期的复杂政治形势下，我国心理学的出路只有进行本身的改造。在全国学习苏联的气氛中，这种改造不可避免地要倚重巴甫洛夫学说。可以说，“在巴甫洛夫学说的基础上改造心理学”的方针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它对维系当时我国心理学的生存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学术方面来说，尽管我国多数心理学工作者不同意将高级神经活动与心理活动等同起来，然而依照这个方针，对一切心理现象都要从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来加以解释，这确实会给我国心理学带来某种生物学化偏向。这种复杂的局面反映出我国当时心理学的困难处境。

在这个时期，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的主要活动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苏联心理学和巴甫洛夫学说，进行学术批判，很少进行具体的心理学研究，这给我国心理学造成一定的损失。在对西方心理学的唯心主义观点开展的批判中，将社会心理学、心理测验和心理卫生等加以全盘否定也是错误的。

（二）整风和批判阶段（1957—1958）

1957年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开展了整风运动。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这场运动中对心理学应否联系实际的问题展开了辩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1958年3月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所的一部分人认为,我国心理学在前一时期主要是进行业务改造,研究工作很少,现在还需要建立巩固的理论基础,然后才能去联系实际,因而主张今后仍要继续以理论研究为主;另一些人则认为,经过前一时期,我国多数心理学工作者已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今后应该加强与实际的联系,研究和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脱离实际去搞理论,要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中去发展我国心理学。经过辩论,绝大多数人赞成现在就应联系实际开展研究(潘菽等,1959)。全国心理学工作者的辩论情况与此相同。这次辩论具有重要意义。它事实上以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来发展心理学的新方针取代了在巴甫洛夫学说的基础上改造心理学的方针,从而为我国心理学在新形势下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经过这次辩论,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我国心理学工作者满腔热情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中的心理学问题的研究。在劳动生产方面,我国心理学工作者与工业部门联合举办了操作合理化讲习班;改进了冲压工等的操作方法,提高了劳动效率;对炼钢工人操作中的“掌握火候”的经验进行科学总结,找出炉内火花的颜色、明度和形状的变化与炉内温度等因素的关系;对联想和“原型”启发在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中的作用开展了研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劳动心理组,1959)。还对细纱工培训进行了研究(陈立,1959)。在医学方面,我国心理学工作者与医务人员协作,开展了神经衰弱等慢性病的综合快速治疗的试验,发挥病人的心理因素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疗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医学心理组,1959)。在教育方面,开展了儿童学习问题和儿童入学年龄问题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育心理组,1959)。这些工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我国心理学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了良好的开端。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国心理学界相应地修订了“心理学12年发展规划”,强调了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研究。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会向全国心理学界发出“苦干三年,创新局面”的号召,要求我国心理学工作者争取三年内在我国劳动生产和教育事业上最迫切的心理学问题的研究中做出显著的成绩(潘菽等,1959)。

正当我国心理学踏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道路时,1958年8月在极左思潮的煽动下,掀起了一场扼杀心理学的批判运动。它打着所谓“批判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旗号,以我国心理学存在着将人的心理“生物学化”、“抽象化”、“抹煞人的阶级性”为借口,把心理学打成“伪科学”。这场批判运动来势凶猛,迅速波及全国。我国许多有影响的心理学家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广大心理学工作者的积极性遭到打击,给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损害。

这场批判运动在方向上是完全错误的,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前一阶段,在我国心理学界存在着直接用条件反射机制来说明一切心理现象的做法。它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无限上纲,走向另一极端,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普遍地带有阶级性,根本没有一切人共有的心理,心理学只能研究阶级心理,而不是研究全人类共同的心理规律,阶级分析方法是心理学的普遍的原则性方法。这种极左的观点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关于心理、意识、精神的基本论述,也是与心理学的科学原理和事实不相容的。人的心理是脑的机能和客观现实反映,任何人不论属于哪个阶级都是如此,人类心理有共同规律。心理学的重要任务就在于研究这些共同规律,但也不忽视某些心理现象的阶级制约性,不排除对

之进行阶级分析,但不能把人的全部心理活动都看成是具有阶级性。心理学不是研究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科学,否则就取消了心理学。后来,1979年4月教育部正式宣布:1958年的心理学批判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彻底平反(光明日报,1979年4月17日第三版)。

(三) 初步发展阶段(1959—1966)

为了消除1958年批判造成的我国心理学界的思想混乱和理论混乱,1959年3月和5月两次召开了北京心理学工作者座谈会,就1958年批判所涉及的心理学的对象、任务、方法和学科性质问题进行座谈,展开热烈讨论。与此同时,国内其他一些城市的心理学工作者也纷纷进行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形成了一场群众性的学术讨论。

在这场学术讨论中,对1958年的批判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展开热烈的争鸣。关于心理学对象问题,针对那种认为心理学只研究阶级心理的观点,我国大多数心理学工作者认为,心理学主要研究的不是心理的内容即知识、观点和思想体系,而是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即心理活动的形式。心理学主要应当研究人类共同的心理规律(曹日昌,1959a,1959b,1959c;朱智贤,1959;彭飞,1959;唐钺,1959)。关于心理学的方法,我国大多数心理学工作者认为阶级分析方法不是心理学的一个普遍的方法,因为有许多心理现象及人的心理过程是不受阶级影响的,他们认为实验方法是心理学的一个主要方法(陈元晖,1960)。与此相适应,我国大多数心理学工作者认为,心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学科或跨界学科(潘菽,1959;朱智贤,1959)。在这次讨论中,针对1958年的批判,我国心理学工作者还指出,研究动物心理对研究人类意识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曹日昌,1959a;王甦等,1961;陈汉标,1961),研究心理的神经机制或生理机制是心理学的一项基本任务(曹传咏,1959;龙叔修等,1959;刘范,1960;刘世熠,1960)。这次讨论贯彻了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持续了半年多。

在这次学术讨论的基础上,中国心理学会于1960年1月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这场讨论取得的收获,纠正了1958年批判的理论偏差,消除了造成的思想混乱。大会制订了心理学三年发展规划,选举潘菽为理事长,曹日昌为副理事长。这次大会对建国初期的我国心理学是一次重要的转机。它不仅扭转了1958年批判给我国心理学造成的严重不利局面,而且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心理学应当遵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

在这次大会之后,我国心理学事业有了较快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相继成立了心理专业。1962年2月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举行教育心理专业学术会议,并决定成立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1963年12月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交流了近年的学术成果。为适应我国心理学发展的需要,1964年8月中国心理学会又创办了第二个学术刊物《心理科学通讯》,丁瓚(1910—1968)任主编。该刊自1966年起改在上海出版。1960—1966年期间,中国心理学会会员增至1056人。我国心理学各主要分支的学术队伍已开始逐步形成。各省市也相继成立地方心理学会。为满足我国心理学教学的需要,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总结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编写出版了《普通心理学》上册(曹日昌主编,1963)、《教育心理学》(潘菽主编,1964)和《儿童心理学》(朱智贤,1962)。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心理学工作者自己编著的第一批教材,对推动我国心理学教学起了积极作用。在60年代,我国心理学研究开始走向繁荣,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 心理过程

关于感知觉的研究有：触觉、视觉和动觉定位（曹日昌，1962；林仲贤，1964）；视觉大小知觉和距离知觉（荆其诚等，1963a, 1963b, 1964；方芸秋，1963；彭瑞祥等，1963）；纯音听觉阈限测定（龙叔修等，1960a, 1960b）；形重错觉（王甦，1963, 1964；沈迺璋，1963）及错觉理论（龙叔修，1962）等。关于记忆、思维和语言研究的有：视、触识记与再认（张增慧、曹日昌，1963）；视、听语文材料同时识记（叶绚、曹日昌，1963）；识记方法（赵莉如、曹日昌，1963；段蕙芬、曹日昌，1964, 1965）；图形特点对思维的影响（卢仲衡等，1964a, 1964b）；汉字字形辨认（曹传谕等，1963a, 1963b）；汉语的讯息分析（曾性初等，1965）等。应当指出，上述记忆和语言方面的一些研究已带有某种认知心理学的色彩。同时，信息论和控制论的思想也逐渐渗透到我国心理学的研究中来。这方面的工作有关于信息量与反应时的关系（徐联仓，1963a）、信息多余性对掌握信号结构的影响（徐联仓，1963b）、人的信息传递效率（封根泉，1965）等。模拟问题也引起我国心理学家的注意（曹传谕，1961）。

2. 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

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主要涉及思维的发展。这方面的工作有：儿童的类概念（刘静和等，1963）；儿童的左右概念（朱智贤等，1964）；儿童的数概念（郑祖心，1960；沈家鲜，1962）；儿童分析概括和辨认汉字字形的能力（曹传谕等，1965a, 1965b, 1965c）；学前儿童因果思维（何其恺等，1962, 1963）；儿童的色形抽象（陈立等，1965a, 1965b）等以及儿童心理发展的一般理论（朱智贤，1960；刘静和等，1965）。关于教育心理的研究有：小学生识字与课文学习（沈晔，1959；万云英，1962；丁祖荫，1964；邵瑞珍，1965；唐自杰等，1965）；小学生解应用题（朱曼殊等，1961, 1962, 1964；赖昌贵，1962；朱玉英，1965）；小学试教代数（刘静和，1960；茅于燕等，1961）；算术教学中的比较方式（冯忠良，1961）；算术学习与思维灵活性（吕静等，1963, 1964）；儿童智力活动的个性特征（张述祖，1964）；小学生课业责任心（章志光等，1964）；儿童道德行为的动机特征（李伯黍等，1964）；中学生参加劳动对学习的影响（刘范，1959）。此外，我国心理学工作者还对程序教学进行了一些试探性研究。

3. 生理心理学和医学心理学

生理心理的研究主要包括应用条件反射方法对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以及应用脑电和皮电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有：儿童的复合刺激的条件反射的年龄特点（季楚卿，1962）；儿童的延缓抑制动力学的年龄特点（匡培梓，1962）；正常和异常儿童的高级神经活动（曹平，1962a, 1962b, 1962c）；人类定向反射的脑电和皮电研究（刘世熠等，1963a）；人类暂时联系的脑电图研究（刘世熠等，1963b）；不同年龄的人的脑电图研究（刘世熠等，1962a, 1962b；蔡浩然等，1965）。医学心理的研究主要涉及神经衰弱、高血压和精神分裂症。这方面的工作有：神经衰弱的皮电和脑电的研究（陈仲庚，1964；龚耀先，1963）；神经衰弱患者的个性特征（王景和，1961）；神经衰弱和高血压病的大脑机能特点（宋维真，1962）；神经衰弱的病因、心理治疗和病人的主观能动性（王景和，1960, 1961a；李心天，1960；张增慧，1961；王启康等，1961）；高血压的综合快速治疗（王景和，1961b）；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机能特点（宋维真，1964）和抽象概括特点（龚耀先，1965）；心理治疗在精神分裂症中的应用（李心天，1963）等。

4. 劳动心理学和工程心理学

劳动心理的研究包括操作活动合理化（曾呈瑞，1963）、劳动竞赛（朱祖祥，1961）、技

能训练(李家治, 1962a)、飞行着陆和飞行能力预测(林仲贤, 1961; 荆其诚等, 1962)等。更多的研究涉及工程心理。这方面的工作有: 闪光信号的频率选择、辨认与等辨量表研制(李家治, 1962b, 1962c); 闪光频率辨认中的时间知觉(赫葆源等, 1962); 相位差对闪光信号辨认的影响(赫葆源, 1964); 闪光信号的语义干扰(李家治, 1963, 1964); 光坪对同时性和继时性闪光信号辨认的影响(赫葆源等, 1965; 李家治等, 1965); 信号组合特点对信息传递效率的影响(徐联仓, 1963)。此外还有一组工作研究了弱电集中控制站的信号显示问题(曹日昌等, 1966)。

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 在这个阶段我国心理学的研究已涉及心理学的一些重要分支; 许多研究是直接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它们对我国有关的实际工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成果是在短短的几年内取得的, 这有力地说明心理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的正确性。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我国心理学, 它经历了调整和规划阶段、整风和批判阶段及初步发展阶段, 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在调整和规划阶段提出了在巴甫洛夫学说的基础上改造心理学的方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它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片面性。1958年极左思潮挑起对心理学的批判, 使我国心理学遭受严重挫折。而在整风期间我国心理学界提出了心理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正确方针, 才又将我国心理学引向繁荣兴旺。这种方针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文化革命时期(1966—1976)

正当我国心理学在1959年后走向繁荣兴旺的时候, 又一股极左思潮开始冲击我国心理学。反动文痞姚文元化名“葛铭人”在1965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的文章。这篇文章打着强调阶级斗争的幌子, 从根本上否定我国心理学的方向和研究方法。它借口我国战斗英雄在脑部严重受伤的情况下仍能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 荒谬地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似乎可以离开大脑, 极端片面地宣扬人的心理的阶级性。它否定科学的实验方法, 主张阶级分析方法是心理学的唯一方法。姚文元的这些谬论完全不是什么新东西, 而是1958年心理学批判时的极左思想的翻版, 在当时的形势下, 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的出笼预示着我国心理学将有更大的灾难。

1966年夏文化革命开始, 在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淫威下, 心理学被打成“唯心主义”、“伪科学”, “应当彻底砸烂”。全国的心理学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被撤消或停办。广大心理学工作者被迫改行, 不少人被送往农村劳动, 有些人遭到残酷迫害, 甚至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也难逃厄运。中国心理学会停止活动, 《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通讯》停刊。整整10年, 我国心理学事业被迫停顿, 蒙受了巨大损失。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坚持真理, 以不同方式进行了抗争。他们或设法参与针刺麻醉的研究, 或编辑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心理和心理学的论述, 或进行社会调查, 了解工厂、学校和医院等实际部门对心理学的需要。这些都反映我国心理学工作者捍卫心理学的顽强精神。

文化革命对我国心理学的摧残远远超过1958年的批判, 极左思潮愈演愈烈。我国心理学

所遭受的这两次厄运都是心理学以外的原因造成的,然而却与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密切关系。这种极左思潮极端片面地强调人的心理的阶级性和阶级分析方法。这个问题在我国1959年的学术讨论中已基本得到解决,但在文化革命中又成为扼杀心理学的一条绳索。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注意。我国心理学必须重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加强自身的抵抗力,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使心理学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在社会上取得坚固的立足点。

四、改革开放时期(1977—)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革命宣告结束。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新的远景,也引导我国心理学走向顺利发展的道路。这个时期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即1977—1980年的恢复阶段和1981年以后的顺利发展阶段。

(一) 恢复阶段(1977—1980)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的心理学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相继恢复,心理学工作者陆续归队,心理学教学和研究活动逐渐开展起来。1977年8月在北京平谷召开了全国心理学学科规划座谈会,初步制订了心理学的发展规划和相应的措施。这次会议是在文化革命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心理学会议,对我国心理学工作者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促进了我国心理学的恢复和发展,成为我国心理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随后,1978年5月中国心理学会在杭州召开了全国心理专业学术会议,商讨了评价Wundt的学术准备工作,还制订了编写心理学各科教材的计划。1978年10月中国心理学会在河北保定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交流了研究成果。会议总结了过去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为心理学恢复名誉。会议期间,中国心理学会还决定恢复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筹备组建医学心理专业委员会和体育运动心理专业委员会。这次会议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心理学的恢复和发展。1979年《心理学报》复刊,后来《心理科学通讯》也恢复出版。我国心理学界开始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

在我国心理学恢复和发展的热潮中,我国心理学教育事业走在前列。1978年北京大學率先成立了心理学系,后来,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校也相继建立了心理学系。与此同时,一些高等师范院校陆续设置了心理专业。这些心理学系(专业)既招收本科生,也招收研究生。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都有了更新和提高,仪器设备也得到充实。至此,我国建成了较完善的心理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机构。

中国心理学会及其下属各分支专业委员会和地方心理学会,为适应我国心理学恢复和发展的需要,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间广泛举办了各种形式的讲习班,介绍了国际上心理学的新成果、新方法和发展趋势。这些讲习班对提高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的业务水平、迅速恢复我国心理学教学和研究起到了极其有益的作用,得到我国广大心理学工作者的好评。

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中国心理学会与许多国家的心理学会和心理学家建立了联系,开展国际交流。1980年7月中国心理学会加入了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在这个时期,我国有相当数量的心理学工作者出国访问或进修,一批青年去外国攻读心理学学位。

在恢复阶段,我国心理学的研究工作陆续开展起来。1979 年 11 月中国心理学会在天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这次会议规模空前,论文内容涵盖了心理学各主要分支,论文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会议期间,中国心理学会还决定成立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工业心理、生理心理等专业委员会。这次会议反映了我国心理学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经过短短的几年,我国心理学已经得到了恢复。但这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到文化革命前的状况,而是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这表现在:1. 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的思想得到解放,一些禁忌已被打破,过去被否定的一些学科如社会心理学、心理测验和心理卫生等重又得到新生;2. 我国在解放后首次建立了一批心理学系,使我国具备较好的培养心理学专业人才的机构;3. 打破封闭的局面,与国外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交流,使我国心理学工作者能更好地吸收国外新的心理学研究成果;4. 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心理学研究工作已不再局限于大城市或大单位,有更多的单位开展了研究工作;5. 研究工作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一些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得到更新,我国心理学研究也已涉及到当前国际上一些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

(二) 顺利发展阶段 (1981—)

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心理学遵循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在经过恢复阶段之后,走上了顺利发展的道路。自 1977 年以来我国心理学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 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

文化革命结束后,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在我国发展迅速,对推动我国心理学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恢复阶段起,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就对视觉心理学问题开展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中有 3 组研究工作比较突出:(1) 关于中国人眼光谱相对视亮度函数的研究(赫葆源等,1979;陈永明等,1979;许宗慧等,1980;纪桂萍等,1980;马谋超等,1981);(2) 关于中国人肤色色度和记忆色宽容度等问题的研究(林仲贤等,1979a, 1979b, 1981;彭瑞祥等,1979, 1980a, 1980b;焦书兰等,1984),此外还研制出标准色板和电视彩色肤色测试卡(孙秀如等,1984, 1987;林仲贤等,1985);(3) 关于视觉拓扑特征检测的研究(陈霖,1982, 1986, 1987)。

我国心理学工作者还对听觉和触觉开展了研究。听觉的研究涉及普通话听力估计(方至等,1979;王乃怡等,1979)、塞辅音元音和声调知觉(杨玉芳,1988a, 1989)、音位知觉(杨玉芳,1988b)和听觉调谐曲线(方至,1987)等。触觉研究涉及触摸方式和长度知觉(王甦,1979, 1981, 1985;韩凯,1983, 1985)等。

自 1980 年起,我国心理学对心理过程的研究逐渐转到认知心理学的方向,汉语文的信息加工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方面的工作涉及汉字结构的统计分析(彭瑞祥,1982)、汉语语词的短时记忆广度(喻柏林、荆其诚,1985;张武田等,1986, 1987, 1990)、汉语语词的短时记忆编码(喻柏林,1985, 1986, 1990;莫雷,1986)、汉字信息提取(彭聃龄等,1985, 1986;陈永明等,1985;张积家等,1990)、汉字的音似和形似的启动效应(张厚粲等,1989)、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中的句式效应和语言单位大小效应(喻柏林,1988, 1989)以及机器理解汉语(李家治等,1982, 1985;陈永明等,1988)。此外还开展了一系列其他课题的研究,涉及记忆与信号检测论(杨治良等,1981;张述祖等,1983)、内隐记忆(朱滢,1989)、问题解决和决策过程中的策略(汪安圣等,1988;王重鸣,1990)、句子理解(陈永明等,1990;李栗,1990)以及个性问题(高玉祥,1985;陈仲庚等,1986)。